

清华大学与清华学派

○ 胡伟希



胡伟希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西哲学比较、中国思想史研究。

如果要问：为什么这种体现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趋势的学风能在清华占据主流地位呢？假如回顾文中提到的清华“学术至上”、广延人才以及通才教育的做法，那么，答案是不难寻到的。

1949年以前曾执掌清华大学文学院的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写道：“清华大学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

按理说，一所高校的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长足发展，需要借助传统，而对作为培养和输送留学人才的留学预备学校来说，是谈不上有自己的人文传统的。但恰恰是这所表面上缺乏自己的人文传统，且“欧化”甚深的学校，在改制为大学以后，只用了很短时间，就跻身于全国第一流大学之列，并且在人文学术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这其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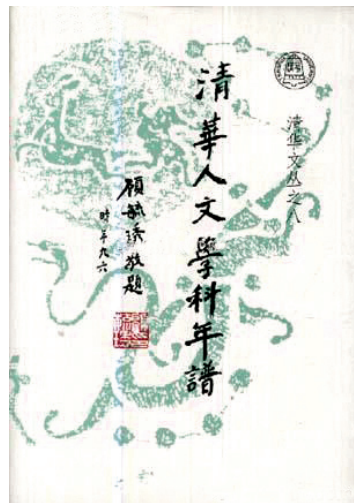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其实，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没有自己的人文传统，这话并不是十分确切的。虽然利用庚子退还赔款建立的清华留美学校，其目标是向美国输送留学生，故英文和西洋文化在整个学校的教育设置中处于主干地位，但从创办之初起，这所学校并没有忽视对学生的中文及传统文化教育。尤其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国内“教育独立”呼声的增高，清华学校也开始酝酿改制办大学。清华学校改办大学的目标很明确，是“希望成一造就中国领袖和人才之试验学校”。说到“领袖人才”，按时的理解，以为是指领导国家的政治人才，此说大谬。按照清华当时治校者的理解，所谓“领袖人才”乃“领袖群伦”，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作出表率的人物，故这里的“领袖人才”实即“榜样”、“卓越人物”之意。而要造就这样的领袖人才，人文学科的知识

不但不可缺少，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清华学校在筹划办大学时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筹办国学研究院。筹办国学研究院一事进展很快，其正式成立还在大学建立之前，足见治校者对此事的重视。

国学研究院办得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它能否搜罗第一流的学术人才。《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记载有这么一件事情：吴宓手持校长曹云祥的聘书到王国维住所，聘请他出任研究院导师，进了客厅，先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才说明来意。吴宓在日记中记述王国维的感受是：“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到，当时清华国学院为了延聘到第一流的人才，确实做到“思贤若渴”，是十分有诚意的。

如果有人以为这只是清华国学院创办之初，人才缺乏时期的一时之举，那就错了。即便到了三四十年代，当清华大学已经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而且这些人才中相当一部分留在本校任教员之后，清华依然没有放弃从各地招聘学术人才的做法。从《年谱》中可以看到，三四十年代相当一批富有学术造诣，并且为清华大学的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人物，如冯友兰、朱自清、蒋廷黻等人，都并非“清华出身”；对于有真才实学的



《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作者: 齐家莹 主编: 徐葆耕)



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1925年），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

学者，即便不能到清华任专职教员，清华也会尽力请他们来做“兼任”教员，或者举办学术讲座。清华大学之注重从四方广罗人才，视人才为学校教育与学术发展之第一生命，可以体现在梅贻琦出任校长时演讲中的一句话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人才难得，而人才要能发挥出作用更难。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等，如此之多的学术精英集中于清华，并且正是在清华这段岁月留下了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学术著作，这同清华大学能为这些学者们提供一个比较适宜于做学问的安静环境有很大关系。上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的大变动中，外界的，尤其是政治的干扰实在不少，但由于治校者施行开明的措施，使清华大学较之当时其他许多大学，享有更多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

事实证明，只有赋予教授相当的权力，以适当形式使全体教授参与学校的决策、管理，才可以确保清华尊重人才和学术发展。而清华大学自创立之初起，就开创和造就了一种尊重人才和“尊重学术”的传统，这从国学大师王国维之死在整个清华师生员工中引起的震动可见一斑。王国维去世后，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并且出“王国维先生专刊”。迄今，由清华大学国学院全体师生树立的“王国维纪念碑”还屹立在清华的校园内。

看来，清华大学人文学科的长足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同清华国学院成立以来就形成的一个重要传统——“学术至上”是分不开的。半个世纪以后，冯友兰在回顾清华大学走过的历程时，将这一传统归结为“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

包”，而且，他认为这是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说来鲜为人知，今日的清华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驰名的高校，但它的前身却是一所以人文为主的“贵族学校”。它的目标并非培养仅只有一门专业技艺的“专才”，而是造就具有良好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通才”，这一目标，至少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创立之初就已经确定了。到1925年，当清华酝酿成立国学研究院的时候，围绕课程的设置曾发生过一场争论。按理说，国学院是培养高深的国学专门人才之所在，诚如国学院“章程”中所言，“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这样，很自然会产生一种想法，即认为国学院在课程安排上，也应以“专”为主。事实上，当时一些人，包括校务会议中的一些人士曾经是这样认为的。这表现在1926年清华校务会议上在讨论国学研究院的发展计划时，否定了国学院原有的扩大规模的方案，通过了“此后研究院应改变性质，明定宗旨，缩小范围，只作高深之研究，而不教授普通国学”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当即遭到以梁启超为首的国学研究院的教授们的反对，因为按照梁启超等人的理解，真正的高深专门知识，应该是建立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的，因此，哪怕是培养专门人才的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其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一定要宽。正是在梁启超等人的坚持下，后来校务会对国学院原来的方案重新加以研究，采纳了其中关于将“普通演讲”列为学生必修课的建议。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学研究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成才率之高是惊人的，这同当时国学院重视拓展学生知识面的“通才教育”方针的贯彻有密切关系。

如果说，在清华学校或国学研究院创办时期，它是有人文为主干的学校，实施“通才教育”还容易理解，那么，到了30年代，当清华大学各个专业都发展起来，尤其是理工科也逐渐壮大起来的时候，“通才教育”是否显得过时了呢？应该说，在二三十年代，甚至更早，不少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不如西方，因此，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发展与国民经济关系密切的工科，是高校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但提到发展工科，是否就意味着高校，尤其是像清华大学这样已经拥有国内第一流师资、

设备和图书资料等条件的大学，就满足于仅仅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呢？对这个问题，工科出身，从1931年起长期执掌清华大学校政的梅贻琦有明确的回答。在《大学一解》中，他将大学之道归结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认为“大学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而就其声教所暨者言之，则充其极可以为国家文化之中心，可以为国际思潮与朝宗之汇点。”因此，大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可以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之人才；要做到这点，大学之教育需注重“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这就绝不是靠单纯传授知识所可达到，而必赖于培养“通才”的“通识”教育。应该说，持这种“通才教育”思想的不只梅贻琦一人，他表达的不过是清华大多数教授们共同的心声和见解。他强调，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他尤其谈到培养“工业的组织人才”的重要，而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

有这样一种重视“通才教育”的深厚传统，难怪从事人文教育与研究的教授和学者们，在清华大学会有“如鱼得水”之乐，因为他们从事的人文教育与学术活动会在整个校园，包括学生当中产生很大回响，而绝不仅是少数学人“象牙塔”中之事。潘光旦将这种教师带领学生一道参与人文理想的营造活动称为“从游”。在如此一种人文气氛中，清华的人文学术之盛可以想见。

中西兼通之途

清华人文学科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产生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甚大的清华学派。清华学派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其在学术主张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提倡学贯中西，融会古今中西。这不仅表现在文科各系的教学方针都突出“中西兼重”之宗旨，还表现在课程的设置上中外知识的并重，表现在教师们的治学研究中中西方法论的横通和贯通，等等。

学派的形成除了要有共同的学术文化主张和文化理念作为思想之维系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还要有一个经常在一起相互切磋、讨论问题的学术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共同的学术规范才能形成。以清华大学哲学系为例，“新实在论”这一共同哲学取向并不是先由某位学术大师钦定而后其他人跟从效仿的，而是哲学系的教师们在切磋问题时逐渐形

成的共识和默契。这中间，既有思想的碰撞，更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吸收、接受和融合。冯友兰谈到他和金岳霖之间的思想交流时说：

我们两个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响。他对于我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我对他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

学派的形成过程中，方法论的反省和自觉常常起到重要的作用。早在国学研究院创立之初，吴宓就强调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当重视方法论的突破，以区别于传统国学，他说：

惟兹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后来，冯友兰还专门就清华大学文科应当树立的学风同朱自清交换意见，提出要超越当时学术界盛行的“疑古”之风，走“释古”之路。1934年，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一文中，更从历史的高度对中国学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作了鸟瞰，指出：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不是像第一、二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用一种文化批评另一种文化，而是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批评。

从《年谱》中可以看到，这种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的学术文化理念，引导清华的人文学者们辛勤地进行学术耕耘，取得了一项又一项学术上的重大突破。

应当指出，清华学派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学术文化理念、并成功地为人提供了学术范型和范式的学术派别，其实并不以清华大学为限。中西文化之融合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大趋势，一些不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学术大师，如汤用彤等人，其学术方法与路向，亦是融会古今中西的。但毕竟要看到，只有在清华大学，这种融会古今中西的学风才显示出它的集团优势。如果要问：为什么这种体现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趋势的学风能在清华占据主流地位呢？假如回顾文中提到的清华“学术至上”、广延人才以及通才教育的做法，那么，答案是不难寻到的。❶